

# 从“不对称”看货币结构体系及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大分流

## ——评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何平

2003年1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黑田明伸教授寄来了他刚出版的专著《货币制度的世界史》（日本岩波书店）。这是一本人们抱有很大期待的专著。2006年初，本书在日本已是第四次印刷了，日文版的发行已达5000册。2007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翻译的中文版。

### 货币职能的分解与统合：货币职能同时集中在任一货币上吗？

黑田教授这本洋溢着睿智和缜密逻辑分析的著作，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教益呢？下面我就从近年自身涉足的两个领域谈谈本书给我们的启示。一是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意义；一是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的意义。

今天的货币银行学标准教科书，都要列出专章讨论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其基本内容是根据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来给货币下一个定义。历史时期出现过的货币形态种类繁多，从古代许多地方可见的天然海贝（比如中国夏商时期的统治中心地区及以后迄止清朝道光年间的局部地区）和耕牛，美洲殖民地的烟草，中国及亚洲地区广泛流通的铜钱，到金银等贵金属铸成的硬币（中国白银的流通，长时期采用秤量货币形式的银两制度），银行券与银行存款，不可兑现的纸币，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债等等，再到今天人们熟知的“e-货币”（电子货币），包括广泛的实物形态和金融资产种类。倘若用归纳法来给货币下一个经验性定义，实在存在一定困难。这样，从理论上给出一个概念就显得必要。而从货币的职能出发来确立货币的定义，则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一般而言，在任何时候的任何社会，货币都可以这样来表述，它是现实生活中执行着货币职能的全部实物和金融资产的一个集合。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将货币的职能归纳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由于世界货币的职能与前四个职能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含义，所以核心是前四个职能。西方学者通常把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合在一起来表达，这样一来，货币就被概括为具有三个主要的职能，即交易媒介、价值储藏手段和记帐单位。在特定的场合，要用经验的方法识别出货币，就要看作为考察对象的特定事物是否或多或少执行了上述职能。

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有些理论着重强调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Baumol, W.J [1952], 'The transaction demand for cash: an inventory theoretic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6, 545-56.），而另一些理论又着重论述了货币在资产组合决策中的地位（Tobin [1958] 'Liquidity preference as behavior toward risk',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5, 65-86.)也就是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虽然凯恩斯早就认为货币作为记帐单位“这一职能是货币理论的基础概念”(Keynes, J. M. [1930] *A Treatise on Money*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但总是被后来的研究者放在最不重要的位置。

黑田教授的专著全面关注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确立的这种“三位一体”的货币概念, 并探讨了通常由此引出的人们的疑问。

人们第一个要提出的问题就是, 可以作为货币的那类物品或资产是否在逻辑上说需要兼具货币的三种不同的职能? 黑田教授在本书中用世界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事实进行了回答。已有的历史材料表明, 一般而言, 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货币在特定时点只有记帐单位和交易媒介两种职能, 抑或记帐单位和储藏手段两种职能。本书中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手交(hand-to-hand)货币就是记帐单位和交易媒介的组合, 当它们服务于所谓“时间的交换”(见终章第2节)时, 便是记帐单位和储藏手段的组合。那种利用债权债务来缓解实体货币供给不足而引出的信用, 如果看成货币的替代品的话, 它应是记帐单位和储藏手段的组合。第6章第3节论及的十四世纪英国相距伦敦东北88公里的科尔切斯特, 小笔的信用交易的盛行规避了货币供求的紧张。将商业交易引起的资产转移作为居民之间的债权债务来处理。这种信用便有资产储藏的意义。这样看来, 似乎所有的货币形态都伴随着记帐单位的职能, 也就是说记帐单位是和特定的货币实体不可分割的一个职能。但是, 中国历史上的短陌(第4章第2节)和各种各样虚银两(第4节), 却将记帐单位与货币实体分离开来。就是在日本, 18世纪后半期实行的所谓文目钱(称量银)计算单位(见终章第4节), 事实上也是与实际流通的铜钱相分离的。

人们进而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 是否可以设计一个相融合的体系, 使得其中货币的各种职能分属于不同的资产? 这个问题换句话说, 可以表述为, 一个国家实体内是否可能有多种货币的存在? 这是黑田教授在本书中倾注了最大精力的一个问题。

人们熟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氏, 以作为促成跨境欧元诞生的理论基础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荣膺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他的基本假定是, 倘若一个地区的资本和劳动能够自由地流动, 建立统一的货币就是最有效率的。黑田教授从这一假定隐含着的推论(也就是, 即使在一个国家之内, 倘若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 多种货币的并存就是可能的)出发, 用世界范围内的实证材料透彻地分析了在多个国家的相当长的阶段, 多种货币竞争并存的事实。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国家一种通货的历史性, 也就是, 一个国家只拥有一种通货的情况, 只是特定历史时点的产物。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将与一国一通货制度不同的货币流通状况表达为, 超越国境的货币和国境内多种货币的并存。

在第1章, 黑田教授分析了超越地域空间(国境)以环状展开流通线路的例子, 那就是玛丽亚·特丽萨银币在东非及红海沿岸阿拉伯半岛的流通。玛丽亚·特丽萨银币是地区之间的结算通货, 它流通地区经由的那些国家内部, 同时流通着本地通货, 从而形成不同层次的货币。玛丽亚·特丽萨银币作为跨越大的地区的结算通货而发挥作用, 是

作为从出产地运出物资的货款而使用的通货。当它在收购地不足的时候，没有引起物价的下降，而是因为通货不足导致商品短缺，进而推升了物价。它与出产地市场内部交易的通货的供求是相互独立的。这个多层的货币流通结构就是，在亚丁那种超上层的市场用英镑或卢比，连接上层市场相互之间交易关系的玛丽亚·特丽萨银币，在下层市场，铜钱等各种各样的小面额通货或者商品货币自律地流通。上、中、下三个层次货币的供求，相互独立。意大利进而英国政府试图引进固定的比价通货体系，全部都归于失败。

在第2章里，黑田教授论述了在空间内试图统一的线路。一国的流动性以一种货币来估算的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前提，是世界规模地夺取残存的地域流动性的自律性。原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地货币都是差别化地服务于特定的交易层次。在古代中国，如果专用银，由于其价值太大，没有铜钱的话在旅行中便“吃饭都不能了”。在13世纪的英国，由于单位银币价值太高，便只有以增减半便士能买到的一条面包的大小来表示价格的变化（见第2章第3节）。

在第3章里，以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的、从莫卧尔帝国统治期到英国殖民地统治初期的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地方作为主要对象，不时援引中国的例子，探讨了竞争并存的各种货币的情况。第4章则从更长的时间序列来论述中国的竞争并存通货的情况。第5章则探讨了中国货币流通在空间上的广度，也指出了在受中国铜钱影响极大的东南亚、日本在钱币流通上也曾有基准钱和通用钱的划分，而服务于不同的领域。其细节书中已详细加以论述。这里要提到的是，就是在完全实行铜钱流通的条件下，人们对于铜钱的使用方式，也显示出分层的意向（第4章第5节）。

中国铜钱最大的特征在于，致力于保持空间上的统一性和时间上的一贯性。中国封建王朝只将铜钱作为事实上唯一的硬币来发行。但是，每一个地区都对它们进行各自的转换解读。这种铜钱使用上的地区性自律化以两个方向表现出来，一个是面额的表示方式上使用短陌，一个是铜钱一枚一枚地使用，出现了所谓“撰钱”。两者都从铜钱的使用上表现出货币多元存在的意义来。关于短陌，我们更多地解释为弥补铜钱短缺的一个措施。篇幅之故，这里不加申论。关于“撰钱”，因为与日本货币流通的历史关系密切，为了能很好地理解黑田教授著作的内涵，下面特别加以说明。

日本汉字“撰钱”，实际可以理解为“选钱”，由于“选钱”在中文文献里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词汇，人们并非一见即知其确切含义，所以径直沿用“撰钱”汉字，偶尔译为挑拣铜钱。

在日本，撰钱行为是与战国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混乱的通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经济以及经济以外的行为，来自中国以当时的制钱洪武、永乐、宣德等各种钱为中心，那之前宋元时代的古钱或在南方铸造的私铸钱大量地流入日本。就当时日本而言，由于已有皇朝十二钱或者此前进口的中国钱的存在，杂乱繁多的钱币交错地流通，呈现出严重的混乱局面。进而进一步变本加厉的是日本本国的私铸钱。

日本的私铸钱，主要是以中国钱和皇朝十二钱作为直接的母型，或者摹仿它们另外制作

母型来进行铸造。由于这种情况，与真钱相比形体就要小，钱文便散、薄、内廓就会变化等，外观粗劣，另外由于材料劣质，易于破碎。元龟天正（16 世纪末期）的时候起，这种恶钱一般称为（金恶）钱，关东称为乌斯贝塔钱。丑女人称为斯贝塔就来源于此，比塔一文的词语也从这开始。

如上所述，在日本、中国劣质的私铸钱大量流通的过程中，本来的正式官方钱币由于长时期的流通或者灾害，磨灭、破损、烧损的很多，在那里就产生了区别良钱和恶钱进行选择，或者拒绝接受恶钱，或者要求增加数量的现象。这便称为撰钱、精钱、精撰等。但是，在当时无秩序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以什么为标准货币，并且在区别劣钱良钱的过程中，将什么纳入怎样的范畴没有统一的基准，而是因时代、地域、当政者的不同，表现出形形色色的状态。比如说，在关东作为标准钱的永乐钱，在京都以西不如说是以恶钱来对待，京钱的概念也是指从关东被驱逐在京都方面使用的永乐钱以外的所有钱币，或者称全部恶钱，或者由于是南京钱的省略语指中国产的私铸钱，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并非一定。撰钱行为阻碍了流通的顺畅进行。

面对流通领域这种货币的错乱状态，幕府、诸大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尝试对撰钱进行管制，屡次发布制令，抑制极端的撰钱行为，以图货币流通顺畅进行。虽然学者将这称为撰钱令，但是没有特别以撰钱令为名的制令。以定、或定撰钱事、定精撰条条之类多种多样名称的法令形式发布。而且，由于内容也是形形色色，可以理解为从各个发布者的立场出发而作出的规定。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具有代表性的撰钱令。

文明十七年（1485 年）四月的大内氏条令，以在当时最早发布的条令而闻名。这反映了大内氏在诸大名之间，早就致力于领国经营而出类拔萃，而且，由于对外贸易的实行迅速地推进了领国之内的货币经济化的事实。这个条令由两段构成，在前一段，虽然从前以来的原则是租税交纳以完好钱币来进行，但从照顾农民的意图出发，可以混入 20% 的永乐钱、宣德钱。在后一段，关于民间一般交易，不问质量、形状如何，永乐、宣德钱不作为撰钱的对象，也就是说，不会挑拣出来而不用。可以堺钱（在堺地方铸造的本国私铸的劣钱）、洪武钱（名称以洪武通宝切圈而俗称的国内私铸的劣钱）、打平（劣质的小型钱在磨薄时为了与其它普通形状的钱无区别地使用用槌打薄的钱）三种作为撰钱的对象。但是，不是只使用永乐、宣德钱。混用 30% 的永乐、宣德就可以了。撰钱令的规定就是这样。永乐、宣德本来应是好钱，现在分析的结果实证表明，永乐钱的成色是铜为 72%、铅 16%、锡 10% 及其它成分这样的好质量的钱。这种情况，意味着以永乐或者宣德为名的劣质私铸钱大量地流通了，此外这也是在西部地区人们厌恶明朝制钱的理由。但是，作为因中国贸易大量输入钱币的大内氏，不能将这些恶钱全面使用，便作出了体现妥协、限制其混入率的决定。在税收缴纳的场所和民间交易的场所设定了 10% 的差额，可以看得出来其用心之苦。

其次，永正五年（1508 年）8 月的幕府条令，虽然相当于室町幕府发布的十九次撰钱令的第六次，但是，规定称，每当使用精钱时，京钱（前面解释过的种种）、打平钱，其它的渡唐钱、永乐、洪武、宣德、破损钱合在一起，允许通用至 1/3，恶钱的买卖一律禁止，违

背上述规定者不问身份处以严刑，没收自宅。

永乐十二年（1569年）三月，织田信长在四天王寺境内发表的定精撰条条为名的条令也是很有名的。其规定内容是，阔落（打平中的还未打薄前的小形钱）、宣德、烧钱、下下这些古钱以两倍使其通用，惠民、大欠、破损、磨损按五倍使之通用，打平、南京（在南京、中国南方私铸的劣质钱，但由于当时铅称为南银，也有说是指铅钱的）按十倍使之通用，反钱、地子钱、公事钱以及金银唐物绢布质物五谷以下其它的商品以原来一样的价格支付规定的货款，各种事务的结算以精钱和恶钱各半来进行，精撰未决期间不得有押买、粗暴的行为，同时，违反这些规定的应当处以严刑。如同这个制令所看到的，这个撰钱令较之幕府的撰钱令比起来，钱币的交换比率按每一组细分开，将它进一步囊括进混用率的网罗，变得更加细腻了。由此可以看出，从流通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大概其的规制方法来管理是完全无效的。

在法定货币不存在的情况下，对撰钱进行法律的压制终究是难以办到的。信长在此之外没有发布撰钱令了，到了后继者丰臣秀吉的时候从未对撰钱表现出一次关心。他的目标是从金银币的制定很快进展到近世币制的统一，而那为德川氏所继承、实现了（参见[日]久光重平《日本货币物语》，每日新闻社，1976年）。

不同的货币是服务于不同层次的市场。黑田教授在本书的多个场合（主要是第345章）论述了，在一个国家内多种货币并存历史事实。并指出，这种情况暗示出，一方面，以自由货币创造为理想的哈耶克式世界，未必减少了交易成本。同时，也体现出通货并存本身具有赋与多层市场相应的稳定性的一面（第3章第5节）。与此相应，货币需求也表现出层次来。所谓货币需求不是一般地存在，而是存在于每一个别的渠道之中，而且是并行存在着的（第3章第4节）。

本书在货币理论上的又一关注重心是货币的起源或产生。在本书中，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例，应证了马克思的断言。货币这个东西，的确“不是反省和协商的产物，是在交换过程之中本能地形成的”（Marx,1961,S.35,日译34页）。应当交易的物品积聚起来的话，即使制度化的通货供给突然瘫痪，人们也会灵敏地作出反映、创造出货币的。这既反应在中国明代泉州的例子中，也反映在二战期间美国华盛顿州的例子中（第2章第1、2节）。货币的诞生，并非只是在太古时期某一时候一次性产生的，而是如同本书看到的，是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事情（终章第2节）。即使没有作为制度予以确立，要使某种物品作为通货发挥职能，在地域的人们之间松散的协议自行地能够达成。正是这点，支撑着历史上以各种各样形式表现的货币现象，是看不见的基础性制度体系（system）。本书试图指出的论点，说到底，与此有关。在这里，表达为“基础的”，意思是指形成更大的但不稳定的结构的制度体系崩溃之时，回归到那里的稳定的平衡状态（Prigogine, 1997, p.30,日译本25页）。据此论述（第2章第1节），再发达的货币形式和货币制度，当危机袭来崩溃之时，本书描述的处于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货币的根底地位的“地域流动性”会自发地创造出来，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理解货币诞生和货币本质的钥匙。

本书关于货币不是由于互通有无，却因“时间的交换”而产生的情形的论述（终章第2节），尽管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令人耳目一新。凡此种种，本书关于货币理论相关范畴所作的历史解读，还有很多，都增进了我们对于货币理论的认识。

## 东西方历史发展大分流的货币根源：货币短缺及货币形态的差异与社会制度存在怎样的关联？

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本书建立起了独特的东西方历史比较框架。在现代世界，东亚取得了富有生气的经济发展。近年形成了东亚跨国的大区域经济圈。而它的形成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跨国大区域经济圈有很大的不同。经济是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的。不同的大区域经济圈差异很大。这就直接关系到经济形态的不同。近代社会科学发端于西欧，便导致了以欧美为中心来解释东亚，结果是东亚的现实发生偏离。过往人们对东亚的评价、看法，由于世界情势和亚洲实际状况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东亚奇迹”论，也有近年喧嚣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如何创立一个符合东亚独特性、多样性的理论，是社会科学建设上的重要课题。日本学者一直有寻求东亚社会区别于欧美社会的独特性的努力，最近20年获得了突出的进展。近年，东亚史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新潮流，坚持对东亚的实证研究，创造出新的理论。日本学者中村哲将这些理论归纳为：(一)小农社会论（中村哲）；(二)亚洲内部贸易圈论（杉原薰）；(三)市场、通货制度类型论（黑田明伸）；(四)殖民地资本主义论（中村哲、堀和生）；(五)日本资本主义的复线形成论（中村隆英、谷本雅之）；(六)前近代专制国家论（渡边信一郎、足立启二）。这些论说，有相互重合的，有持论对立的。可以说大多尚未完全定型，在不断变化和完善（参见[日]中村哲主编《东亚近代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而本书的作者黑田教授被归为市场、通货制度类型论者。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日本中国学界，黑田明伸教授是试图将中国历史与它同时期的世界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少数几个杰出学者之一。1994年，黑田明伸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华帝国的结构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在那本书里，他从清代货币制度史的角度检验了封建中国晚期的经济结构，他发现，尽管基本上在封建中国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非常活跃，但是，有一个“地域通货”与“地域间通货”的双重结构。在这个双重结构之下，农产品的交换使用地域通货（铜钱），而地方市场之上的支付安排则依赖于白银，白银适于作为资产来积累。结果，封建中国晚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基于一价原理支配的均衡市场的经济体系。通过将它与以集中的价格和单一通货体系为特征的“世界经济”比较，黑田将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称为“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模式”。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获得了“三得利学艺奖”，如同颁奖委员会赞辞所称道的，它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完全的分析结构”。在这本《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作者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的货币制度的研究和发表他有关货币和市场理论独特的和崭新的解释和理解，以更加广泛的洞察和对不同地区市场经济特征的探求继续他原有的分析方法。

从市场、通货制度角度来将东西方历史类型化，本书进行了透彻的比较分析。黑田教授将货币区分为“地域流动性”和“地域间结算通货”。使在某个空间上统一的库存的贩卖可能性实现的东西，在本书中总括地称为“地域流动性”。这种地域流动性，是处于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货币制度的底部的东西。其构成的内容，既有商品货币，也有集团内的人的信用，当然也有手交货币。“地域间结算通货”是对应于“地域流动性”而言的。由小农经营构成的农村，就是“地域流动性”活动的舞台。受农业季节性限制，农产品的销售也因收获和闲散时期的区别有很大变动，相应产生货币需求周期性发生很大变化。影响这种变动的因素，还有税收和地租。从很远的地方来购买农产品的商人，如果不用媒介地域间交易的“地域间结算通货”白银之类高面额的货币和当地的小额货币即“地域流动性”交换就不能买卖，高面额的货币和局部使用的小面额货币有使货币市场分割的倾向。它们之间在传统社会是不对称的。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本书提出了许多关注之点。比如说，在中世纪西欧，领主或商人们之间由银币进行的交易，与在农村的商品货币或者银表示的物物交换之间存在背离倾向。而在中国，不持有金银币而只限于钱币，农民通货使用的频度可以说存在着更为私密的意愿。如果按照代表地域流动性的本地通货和承担地域间交换性的地域间结算通货之间的区分，地中海、西欧世界易于向地域间结算通货倾斜，中国易于偏向本地通货的表现状态。但是，东方和西方的这种差别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作为分水岭的是十三世纪。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蒙古帝国欧亚大陆东西贯通的影响，使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减少，远隔地区的交易飞跃发展。作为地域结算通货的白银的使用，从西方延伸到东方。但是，流通量增加的不仅仅是白银，钱币、贝币、进而低质量的银币也包含在内，适于参与地域流动性的东西同时扩大了。这也是开始侵蚀此前由商品货币完成交易的领域的时代。但是，遍及欧亚的白银流通，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不得不中断。在西方被迫产生出应付白银紧缩的对策，在东方则留下了用白银来征税的记忆。使用白银将东西联结起来的十三世纪一旦销去其痕迹，便成为后来变动的起点。

通过13世纪地域间结算通货白银的流动而实现的东西融合，既然缩小了欧亚全体的地域流动性的商品货币领域，所以，从14世纪后半期开始，白银流通一完全停滞，便出现两个动向。第一个动向，是试图获得具有地域流动性的贵金属的动向；第二个动向，是以独自的手段维持地域流动性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动向。在后一个动向里，就有了三个方向：向以白银之外难以流出的零细面额通货转换的方向A；回归到物物交换的方向B；还有处理以封闭性地域团体效力决定的团体内部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交易的方向C。

覆盖十三世纪欧亚大陆的白银流通，对于各地域经济来说，形成了过剩的地域间流动性，结果失去控制，与蒙古帝国一同崩溃。因为，在没有边界的广大蒙古领域，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完全允许白银无限制地流出入。相对于此，在十六世纪走上舞台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以利用边界制度体系的形式出现了。那便伴随着控制地域间交换性和地域流动性

之间的本位制的制度。

“本位制”这个概念，只有在一国之内流动性全体被同质地接受的状态下才具有意义。本位制内生地产生的社会，是具有 C 的方向性的社会。尽管 A、B、C 的差异在当初并没有那么明显，但遭遇十六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白银的大流通的地域间流动性过剩状态，其差异便扩大。最终吸纳白银的中国或印度，及至 18 世纪，铜币或贝币等大量的零细面额通货滞留在地方，小农们向地域市场的参与增强了，同时，自律的地域流动性形成了（A）。在中南美或者东欧，与出口产业相关的大土地经营者和贸易关联商人垄断着兑换性极高的货币，另一方面，生产者沉浸在日常的物物交换之中（B）。与它们在地域流动性和地域间兑换性之间都出现偏离不同，埋没了货币需求季节性差异的 C 方向，消除了地域流动性的自律性，与收税的转账汇划网相联接，为与地域兑换性的融合作了准备。在这里，一国的流动性以一种货币来推测的本位制制度体系渐渐地露出了自己的身影。此外，以各个地域的债权债务为基础的**内部货币（inside money）**的形成，很快成了英国、德国或者日本形成地方闲置资金池的基础，支撑了工业化的初期投资（参见第 2 章）。

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从货币的空间性和社会制度上的要素有无关联的角度，以中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欧的例子为依据，论述了东西方地域流动性的各自特色。黑田教授将制度的要素归纳为，第一，支撑底层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农们参与市场的自由度。第二，使人们共同拥有货币的组织机制。他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基准，将各个社会加以比较。

——在 20 世纪初的山西太原市附近的晋祠镇，当地的小农和集镇是自我组织化的地域流动性。有两个特点：第一，通过商店相互发行钱票使其在地区上流通来对货币供给赋予灵活性。钱票，从形式上看可以分为发行商店接收的定额期票，事实上，没有设想兑换事宜，钱票的发行实质上不是基于债权债务，而是外部货币（**outside money**）的创造。钱票维持空间的物价动向，是与以更为广阔的市场为前提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独立地活动；第二，钱票发行，是可以自由地参加的。

——在 14 世纪英国伦敦东北 88 公里的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与晋祠镇形成鲜明对照。第一，采取的方法是，以在居民之间频繁进行的信用交易，节约了通货使用的机会。这里所面向的，是将商业交易引起的资产转移作为居民之间的债权债务来处理的、内部货币创造的方向。第二，在晋祠镇那里，支撑钱票流通的制度保证，可以说几乎没有。而科尔切斯特的信用交易，明确地，地区法庭的司法职能成为它直接的支撑。但是，这种法庭是科尔切斯特公民们的法庭。处于地区的内部货币形成基础地位的，是作为这个集镇的**法共同体**的职能。

所以，在自中世纪末到近代初期的西欧，在日常交易之中，货币只是专门表现为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作为实体是以信用交易或者商品货币来体现。也就是说，西欧社会是具有极其节约日常使用手交货币意向的市场经济。

问题的核心不是币材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流通的实际状态。在欧洲中世纪银币的流通中，在握有货币权力的领主在各地，由领主决定的成色或重量的银币在那个地方流通。外部的商

人带进银的时候，在领地之内交易时，又要求铸造成本地银币。此外，领主一决定新的银币，原来的就不允许通用了，必须回收到铸造所重新铸造。西欧中世纪退藏货币的情形之下，一个地方出土的货币群的发行年份集中在极短年代的情况为多。那与跨越长期的历代王朝的铜钱出土的情况为多的中华圈的情况形成对照，反映了每当通货改变，旧的通货就供用来重新铸造的事实。

在欧洲，作为领主权能的银币流通也好，由法共同体支持的信用交易也好，哪一个都在试图对地域空间的流动性进行他律地管理方面是相通的。与既不依赖权力也不依赖团体来调整地域流动性的传统中国例子形成极好的对照。同时，正是在封闭性地域团体不开放的情况里，得以看到西欧地域社会的特性。

黑田教授从日本同西欧都是世界上共同体发达的地区的认识出发，强调了日本近世的那种村落拥有的融通机能。以村官阶层为联接点，村内中上层的家庭比较小的金额以低利相互融通的机构，在村中创立起来了。认为近世日本形成了以村的团体组织为契机的内部货币，补充了他律的外部货币的非弹性供给。当我们看明治以后的日本之际，必须关注在踏上工业化的道路之前，有极其多的银行类似机构在地方产生的事实。日本近代新式金融机构国立银行之类的勃兴，是脱离近世日本集镇和村的融通功能难以说明的现象（关于此点，参考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岩波书店，1982）。他通过制丝金融对中日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在日本的制丝金融中，各个机构的信用供给之间的所谓相互过轨成立，债权是流通着的。长期和短期，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形态上的差异可以看成只不过是它在流通之际的化装。与在中国广泛看到的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的二重结构，明显地有质的差异。在这里，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可以对照地看出与信用供给的流动相伴随的阶层性的有无（第6章第5节）。

本书从地域流动性与社会制度要素关联的角度，指出了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大分岔的缘由。“概言之，小农们越是频繁地利用本地市场，如同在传统中国那样，市场便越是自己去组织自身的流动性。但是，中国的例子未必显示出面向工业化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与其说从进入壁垒低难以预测的自由竞争那里，不如说，货币使用的限制和在共同体内部的融通，在西欧也好，在日本也好，准备了服务于地区工业化的资金积累。……以国民经济作为培育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与其说是从各个社会成员自由度极高的市场参与中产生的，不如说是以某种制度的制约为触媒而萌芽起来的”（第6章第5节）。

那么，国际金本位制的建立、地域流动性的消失、一个国家一种通货制度的建立又意味着什么呢？

国际金本位制，也就意味着在国境内部，流通着的货币之间对称化的过程。十九世纪以来国际金本位制的形成，以世界规模地夺取了残存的地域流动性的自律性。

这个过程是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地域小农经济融入国际贸易相联系的。通过小农产品出口的吸引，纸币朝着它的反方向的浸透，进而伴随事实上的虚价货币化的传统货币的退场，世界上在同时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一通货制度快速地获得了合法地位。

单单只是货币统一，是不可能控制地域流动性的。只有像作为“银行的银行”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设立及其向各银行的信用供给。才能通过债权的集聚，完全填平了地域流动性引起的波动。

意在增强与英镑的兑换性的国际金本位制，完全消除了本地通货的自律性。但是，那样一来，便隐藏着原来由地域流动性处理的货币供求季节性紧张在世界范围内同样严重的危险性。国际金本位制这一地域间兑换性增高到极限的体制，不久便以世界恐慌的形式，为过高的兑换性支付了账单。堆砌起来的积木坍塌之时，人们又到地域流动性里寻求根据。那就表现为第 2 章开头丁尼诺的木片了。

世界经济试图以每个国家采用管理通货制的方法来控制兑换性，发展以迄于今。货币不是在无限的空间大小范围内产生的，应该说是本源地和空间相伴随的东西。货币的历史，是试图在狭隘的空间的内侧一方平衡的动机，与伴随着不稳定同时试图构筑广大地域的兑换性的动机相互斗争摩擦的过程，其冲突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的兴亡联系在一起。

以上，我从货币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两个方面，概略地讨论了本书给我们的教益。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只是想表明，本书除了对关心社会历史理论、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人们有所启发外，对货币金融理论的建设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货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其历史仍然充满各种未解之谜。“货币是什么”的疑问，时常萦绕在我们的脑际。本书论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在远离发行国的中东地区直至 20 世纪初期还流通着的奥地利玛丽亚·特丽萨银币，也有发行了制造成本远高于面额的铜钱、经常创造出“良币驱逐劣币”局面的封建中国的情况，还有在印度流通过的特别小的零细货币、马尔代夫产的贝币，等等。本书在从“不对称性”的概念入手对货币和市场复杂而多层的世界进行解读的时候，对世界历史上的货币现象从根本上进行了重新考察。提出了从古代到现代、全球化视野下新的历史—货币论。

黑田教授在本书正文的最后一段称，“本书根据紧盯市场本身的多层次性，被忽视的货币特点可以重现于眼前。那就是，货币既然是应该流动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为了不过度流动而被设计存在的。……正是美元的受领性变得极高的今天，其受领性在空间上受到限制名副其实的、本书所说的地域流动性的变种的登场，便也是历史的必然了”（终章第 4 节）。这对于善于思考当今货币金融问题的人们而言，是富有深意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氏曾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受中国经济学者经济史知识的制约，黑田教授的《货币制度的世界史》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从历史的视角建设货币金融理论的范例。